

# “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视野拓展

——以《小说月报》研究为例

李直飞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昆明 650500)

**摘要:**在《小说月报》的评价传统中,1921年茅盾的革新是一条前后期泾渭分明的“界线”,导致《小说月报》研究中出现了断裂性和含混性。这条“界线”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研究中“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既有框架相关,更关系到现代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当前的《小说月报》研究趋势来看,质疑这条“界线”的声音不断出现。要破解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疑惑,获取新的学术增长点,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新的思路。在“民国文学”“返回历史现场”的倡议下,“民国文学机制”更加关注作家生存空间、作品传播机制及作家精神空间的保障,为“如何返回历史现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操作路径,从而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的启示,为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获得更加宽广的视野。

**关键词:**《小说月报》;民国文学机制;文学期刊;茅盾;郑振铎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6)02-0021-06

**DOI:**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6.02.003

## 一、《小说月报》研究中的“界线”问题

### 1. “界线”的存在

在现代文学研究里面,《小说月报》一向被视为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型的代表。这种观点跟茅盾息息相关,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总结到: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一月,《小说月报》也革新了……如果我们将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当作一条界线,那么,即使在《小说月报》的范围内,我们也就看见了那“界线”之后(民国十一年,《小说月报》十三卷),已经有些新的东西。<sup>[1]</sup>

茅盾作为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又曾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更是《小说月报》最重要的革新者,他这一“现身”说法带有很大的权威性。因此,在他“一锤定音”之后,将《小说月报》前后期明确地划出一条“界线”,将关注的重点放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便成了现代文学评价《小说月报》的传统。

后来诸多的文学史,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强调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反封建和反艺术至上主义”<sup>[2]</sup>,到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视《小说月报》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会刊<sup>[3]</sup>,都是从茅盾的观点演化而来。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这种评价《小说月报》的传统被逐渐打破。首先,质疑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声音逐渐响起,比如段从学认为“茅盾自己因为《小说月报》的销路不佳而辞去编辑工作”<sup>[4]</sup>,董丽敏认为郑振铎代替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才“标志着《小说月报》真正完成了自己的革新过程”<sup>[5]</sup>。同时,研究者也在试图揭开前期《小说月报》“被遮蔽”的一面,谢晓霞认为《小说月报》的创刊是“商业和文化同构的产物”,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是“过渡时期的杂志”<sup>[6]</sup>,既有新的一面,也有旧的一面。除此之外,研究者也不再固守“反封建和反艺术至上”的标准,不断寻

收稿日期:2015-06-14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 <http://qks.jhun.edu.cn/jhxs>

基金项目:教育部 2015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国经济视域中的《小说月报》(1910-1932)研究”(15YJC751027);云南师范大学 2014 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民国经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研究”

作者简介:李直飞,男,云南宣威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求新的标准来统摄《小说月报》的研究,邱培成视早期《小说月报》是“描绘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种方法”;董丽敏则把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看作是“想象的现代性”,虽然其视点不一样,但企图整合《小说月报》研究资源的学术抱负则是一致的。

## 2. 当前《小说月报》研究中的断裂性及含混性

从研究趋势上来看,《小说月报》的研究在不断突破各种藩篱,向着深度和广度拓展。但无论怎么拓展,这些研究却依然将前后期的《小说月报》割裂开来,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观照,这种局面导致了《小说月报》研究中存在着断裂性及含混性。

将《小说月报》前后期划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从时间上来看,现代文学或新文学通常将开端定为 1917 年甚至是 1919 年,而《小说月报》是 1910 年创刊的,茅盾革新《小说月报》是在 1921 年。按照现代文学的开端来算,茅盾革新前的《小说月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算在现代文学里面,而只能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算在现代文学的时间范围内。从“现代”意义上来看,茅盾革新前的《小说月报》充斥着大量娱乐、消遣人生的“鸳鸯蝴蝶派”作品,这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写实的、“为人生的”、“反封建和反艺术至上主义”的文学格格不入。从建构现代文学或新文学体系的目的出发,论述者将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作为新文学战胜旧文学的革命实绩来看待,而革新前的《小说月报》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现代”意义上,都是旧文学阵营的一部分,自然在现代文学的话语构建中是忽略不计的。

长期以来,这种“历史传统”建构起来的“断裂”是不易或不容质疑的,研究者避免麻烦的措施之一就是各自叙述前后期的《小说月报》,这种研究模式一直影响至今。即使是当前对革新前的《小说月报》有所重视,研究者的心目中还是有意无意的存在着先入之见:要么专门研究前期的《小说月报》,要么直接叙述后期的《小说月报》,将前后期《小说月报》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从旧文学一步步转型过来的研究依旧没有。而文学的转型显然不是一触即发的决然断裂,而是渐进的过程,《小说月报》的转型也是如此,将《小说月报》前后期决然对立,不啻与历史相距一段距离。

断裂性研究带来的影响还不仅仅如此。当前评价《小说月报》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标准,研究者倾向遵循自己的标准来对研究对象进行概括或归

纳,将《小说月报》纳入到不同的范畴中去考察,找到一个关键词,企图将《小说月报》各要素串联起来本来也是一种影响较大也较为时髦的研究方式。比如邱培成将前期《小说月报》纳入到都市文化的研究范畴中,董丽敏将后期《小说月报》纳入到“现代性”的研究中。但由于断裂性的存在,这种研究也较易引起人们质疑:前期的《小说月报》描绘了上海的都市文化,后期就与都市文化脱节了吗?后期《小说月报》充满了“现代性”,前期的《小说月报》有没有“现代性”的因子呢?面对着这类“合理”的质疑,当前的研究模式往往难以做出较为理性的解答。更何况,文化或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较难准确诠释的概念,用它来阐释断裂了的《小说月报》,无疑具有含混性。

《小说月报》研究中存在的“断裂性”和“含混性”,促使研究者寻求更加“合理”的逻辑起点。《小说月报》“断裂性”的存在是基于现代文学“现代”的话语逻辑生发出来的,是在“新与旧”、“封建与反封建”、“现代与非现代”、“精英与通俗”的比照中呈现出来的——这里的“现代”更多的是一个意义概念,而不仅仅是时间概念。正因为“现代”被赋予了太多“意义”,甚至极大超出了文学的承载负担,导致在讨论《小说月报》的时候,前后泾渭分明:前期被视为“非现代”,后期被确认为“现代”。“现代”与“非现代”的意义在现代文学建构上是如此重要,《小说月报》前后期就只能被人为“断裂”了。这种“断裂”造成的麻烦已有研究者意识到,柳珊的《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 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集中探讨了革新前《小说月报》里面刊载的文学理论、短篇小说、翻译小说等文本,发现其中的一些文学理论、小说等难以归为“鸳鸯蝴蝶派”,也难以与现代文学相对接,于是提出了“民初文学”的概念,试图将长期被“遮蔽”的前期《小说月报》纳入到现代文学进程中去。应该说这是《小说月报》研究中一个新的尝试,从“现代”的意义概念回到了“民初”的时间概念,但“民初文学”的概念依然无法彻底解决《小说月报》前后期的“断裂”问题,也无法在更大的范围内对“现代与非现代”、“新与旧”做出回应。

## 二、“民国文学机制”及 《小说月报》研究的新视野

要使《小说月报》研究展现更宽广的视野,使

《小说月报》研究获得更大的阐释空间,从“现代与非现代”、“新与旧”的既有框架中突围出来势成必然,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回归到“民国文学”的时间概念不失为一种较为可行的尝试。在回归“民国文学”的概念下,意味着《小说月报》的前后期将统一在同一时间范畴内,不再出现前期《小说月报》属于近代文学,后期《小说月报》属于现代文学的奇特景观。更重要的是,将《小说月报》的研究从“现代与非现代”、“新与旧”、“封建与反封建”,甚至是“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元对立的纠葛之中解放出来,形成新的视域。当然,“民国文学”的提出并不是全然推翻已有的阐释框架,也不与现存的阐释框架形成非此即彼的关系,他们之间更应该是互补扩充的,“新与旧”、“封建与反封建”、“现代”与“非现代”概念的提出无疑有着充分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合理的内涵因子,也应该成为“民国文学”形成有效阐释力的成分。

在“民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下,《小说月报》甚至现代文学研究能获得什么样的阐释空间?“民国文学”带来的研究视野应该是多重的,而不仅仅是贯通了《小说月报》前后期的界限,更是在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其旨归上带来新的思考。这一点,在以“民国文学”为背景的“民国文学机制”中已现端倪。

### 1. 何谓“民国文学机制”

“民国文学机制”是近年来在“民国文学”呼声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在“重返五四”、“重返民国”、“民国史视角”等诸多与“民国文学”相关联的提议中,“民国文学机制”整合了相关的学术理论资源,反映出更为清晰的内涵和诉求。从整体上看,“民国文学机制”意指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政权——清王朝覆灭以后,新的社会形态(民国)中逐步形成的影响和推动文学新发展的种种力量;或者说,因为各种力量(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结构、精神心理氛围等)的因缘际会,最终构成了对文学发展的肯定,同时在另外的层面上也造就了某种有形无形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都可以在这样的综合性结构中获得解释<sup>[7]</sup>。这一机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空间的基本保障、作为现代知识文化传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为精神创造、精神对话的基本文化氛围<sup>[8]</sup>。相较之下,“民国文学机制”无疑在研究态度、方法、内容及旨归上都有着更为清晰的技术路径。

包括“民国文学机制”在内的一系列“民国文学”命题的提出,反映出来的都是要面向民国历史的姿态。面向历史,就意味着“还原”,从“现代”的意义还原到民国的时间,更意味着还原到文学研究本身。在《小说月报》的研究格局中,无论是“新与旧”的对立,还是“封建与反封建”的总结,都与建立革命话语权息息相关,“现代性与非现代性”、“都市文化与非都市文化”背后隐含的是西方逻辑的话语权力,也就是说,在非自然时序的现代文学里,非文学的话语绑架了文学的话语,造成的后果就是过度阐释。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还原”便具有了“解救”文学研究的意味,使文学研究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上去。

如何还原?在大多数倡议处于模糊之际,“民国文学机制”给出了可操作的方法。“民国文学机制”首先承认历史细节的丰富性。这种历史细节的丰富是我们今天获得阐释空间的源泉之一,承认这种丰富,必然要反对以某种先入的“成见”去粗暴地裁剪历史。“民国文学机制”既不固守“反封建”的话题,也不追慕“现代性”的潮流,所需要的仅仅是重新进入历史,切实把握住历史的相关节点,理清与历史事件相连的各种因素。这无疑需要“考证”的毅力,但这正是“民国文学机制”的基础。《小说月报》作为一份按照近代市场经济规则运行起来的现代期刊,运行时间之久、受到的关注之多,在近现代的文学期刊中是不多见的。这自然与近现代社会的各种因素产生的纠葛分不开,商务印书馆雄厚的资金支撑着其持续发展,又决定着其雅俗格调;政治及法律规避避免于其陷入政治漩涡,又使其丧失发起新文学革命的动力;近代教育既为前期《小说月报》赢得了广大读者,也为反叛《小说月报》打下了基础……这些纠葛既深刻影响着《小说月报》的走向,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变化及精神动态。这些纠葛是如此的复杂,甚至都难以用“封建与反封建”、“现代与非现代”去概括。

当然,“民国文学机制”绝不仅仅将历史看成是尘封的“死物”,并不提倡机械的“知识”复制和累积,“体验”因此成为“民国文学机制”的重要词语,旨在说明研究者进入到历史现场,与历史重新建立起丰富的联系。文学是作者在体验世界中创造出来的,现代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代文学,就因为现代文学是现代作家在现代社会里面体验的结晶,其中既包含了“传统体验”与“现代体验”、“异域体验”

与“域内体验”，“社会体验”和“个体体验”，也包含着作家在现代社会里面的“经济体验”、“法律体验”、“政治体验”等。正是诸多如此的体验，作家的体验各自不同，才建立起了现代文学的多种面貌。这些体验对文学研究者来说依然重要，因为研究者进入到历史时空中去，在历史场域中体验作者当初的生命状态，重新与看似无关的历史要素建立起联系，把握住作者当初的各种历史选择，才能真切体会到作家独特的一面，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对其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不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为中国作家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研究者就难以理解王蕴章的“弃文从政”或恽铁樵的“弃文从医”，会将他们的行径视为是保守或与文学无关的，而难以看到他们曾经对文学的热切改革与期望。没有将矛盾放到商务印书馆的人事变动、经济纠纷及当时的整个社会大背景下，研究者显然也难以想象矛盾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的革新，在充满着荆棘的道路上，矛盾的革新充满了怎样热切的期望。在这里，无疑要求研究者发挥出自身的“主体性”。或者说，这里的“体验”是建立在研究者自身基础上的“想象性的体验”，只是这里的想象绝非毫无拘束的天马行空，而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想象”。文学研究者尽管不可能完全与作者当初的体验高度一致，却能做到尽量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当中既含有作者当初自身的体验，也含有研究者自身的体验，二者合二为一，实现了对文学的再次创造。因为作者的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这种体验表现出了更多的个体差异性，研究也才不是千篇一律，增强了对文学的阐释力度。

## 2. “民国文学机制”与《小说月报》作家群生存空间的研究

就《小说月报》的研究而言，“民国文学机制”要求在现有的研究格局下，更加关注作者或编辑的生存空间。作为向近现代转型的知识分子群体，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作家们的精神流变，而往往忽视了保障其精神层面得以实现的另外一些因素，而经济、政治、法律及教育等社会因素的支撑也是其实现文学抱负的关键。《小说月报》的作家群体贯穿了晚清、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的漫长岁月，在当时风云激荡的社会环境里面，作家身份的急遽变换，直接影响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更导致了他们不一样的文学主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文坛格局。《小说月报》创刊时期的作家，对作家的身

份是不大认可的，这一作家群主要是从晚清读书人中转过来的，比如《小说月报》的主编王蕴章就是举人，重量级撰稿人林纾也是举人，许指严及恽铁樵出身于晚清官宦之家……这一背景导致了他们的心理意识还在封建社会里面打转，固守着“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一有机会就想办法踏入仕途。这从王蕴章1913年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而去民国临时政府任职，许指严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辑要秘书便可见一些端倪。在这种心理之下，进入民国以来最早的一批作家都不认可近现代兴起来的“卖文为生”的身份，更视小说为小道，视小说为“幻云烟于笔端，涌华严于弹指”，从内心深处是不大愿意为之的。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古代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断，而《大清著作权律》等办法，进一步确认了“卖文为生”的合法性。晚清读书人在政治上失去了晋身之路，又面临着经济的压力，尽管心里不愿意，但却不得不以撰稿为生。这样的“过渡型”作家带来的作品便徘徊在“雅俗”之间，既有考虑读者市场的一面，也在其作品中坚守自己的人生立场。既难以跟新文学接轨，也不完全是“鸳鸯蝴蝶派”或“黑幕小说”，即为柳珊所说的“民初小说”。这一类文学作品在当时占了文坛的很大比重，从当时《小说月报》风行一时就可见一斑。随着民国的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在中国初露端倪，知识分子出仕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知识分子在改良路线中又出现了新的分化：要么彻底放弃了传统读书人的“清高”，放弃出仕的愿望，“沉沦”进了市场，比如“鸳鸯蝴蝶派”的崛起；要么走向了激进，以改变中国为己任，正如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作家群体。而“五四”之后，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经济逐渐得到保障（一是靠与杂志社撰文，二是靠进入学校）和对政治身份的逐渐认同（进一步不再以出仕为人生唯一目标），现代作家的身份更加清晰起来，作家与其他职业的界限愈发清楚。比如早期的《小说月报》主编王蕴章又身兼《妇女杂志》的主编，其文学家的身份不是特别明显。早期的《小说月报》其实也更像一份综合类的文化期刊，其栏目有图画、长短篇小说、笔记、文苑、新智识等。而茅盾则以专业的文学编辑身份出现，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栏目主要是评论、研究、译丛和创作，与文学不相关的栏目全删了。这种作家、杂志向着职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显示了现代作家的逐渐形成，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追求，也为现代文学的成熟奠定了基

础。显然,这些问题只能是在将前后期《小说月报》贯穿之后,将其放在民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的阐释,而这,正是“民国文学机制”的目标之一。

### 3. “民国文学机制”视野下的《小说月报》传播

生存空间的保障是作家存在的基础,文学传播渠道的保障则是对作家精神空间的开拓。现代文学期刊的出现是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现代文学期刊使作品的传播速度加快,使作品的传播面更广,同时编辑或作家通过议题的设置,使相关的内容可以得到持久、周期性的关注。但文学期刊的出现同时也使文学传播变得复杂起来。如果仅从精神层面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前后期《小说月报》的对立性;但如果综合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考量,我们也能发现《小说月报》前后期存在着的一致性。《小说月报》的创刊,从商务印书馆的角度而言,显然是为了赢利(《绣像小说》赢得了相当的读者市场,让商务印书馆从中尝到了甜头),《小说月报》正是继承这一传统而来。但是作为一份杂志,它又在传播着精神文化,在商业与文化的双重要求下,《小说月报》的定位就至关重要。在《小说月报》的整个发展流程中,《小说月报》的定位就在商业与文化之间摇摆。在茅盾革新《小说月报》之前,《小说月报》总体上走的是“雅俗共赏”的较为温和的路线,这种温和的路线使得《小说月报》创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销量都是很好的,与当时的文学市场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平衡”。这种平衡到了“五四”前后被打破了,为了挽救市场平衡,商务印书馆不得不更换编辑。茅盾革新《小说月报》时,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从表面的栏目设置、全用白话文到编辑理念都与之前的编辑发生了“断裂”。这种将《小说月报》定位较高与当时的读者水平拉开了距离,连新文学的提倡者胡适、鲁迅等都认为“维新太过”,导致销量依然没有多少起色,“茅盾自己因为《小说月报》的销路不佳而辞去编辑工作”<sup>[4]</sup>。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衡量一份期刊是否成功的关键就是看期刊的销量,这样看来茅盾的革新并未挽救《小说月报》在市场中的“失衡”。与茅盾的激进路线不一样,继承茅盾编辑地位的郑振铎采取更加理性和温和的方式进行启蒙,将茅盾没有重视的“整理国故与新文化运动”栏目设立起来,拉近了与旧有读者的关系,同时也保留住了新式读者,《小说月报》的销量才逐渐稳定下来,与市

场重新平衡,也才达到商务印书馆更换《小说月报》编辑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有研究者认为郑振铎任《小说月报》编辑才“标志着《小说月报》真正完成了自己的革新过程”的原因。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小说月报》的发展就是一个与市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过程,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家们看重的并不是革新的内容,而是期刊的销量与市场的影响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茅盾革新《小说月报》之后,商务印书馆又创办了《小说世界》去拉拢传统读者——在他们眼里,新文学与旧文学是一致的,都是牟利的手段。从“民国文学机制”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现象,显然更能够呈现给我们一幅立体的《小说月报》革新图景。

### 4. “民国文学机制”视角与《小说月报》的“现代”精神

尽管从商业角度来看,由于销量不佳,茅盾革新《小说月报》还“不够彻底”,但从现代文学发展的角度,茅盾革新《小说月报》却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晚清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角度来说,前期的《小说月报》是当时杂志界的“权威”,有着数量众多的读者,编者和作者大多都是当时文学界的名家,又有商务印书馆雄厚的资金支持,在几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现代文学“革命”为什么不是首先从《小说月报》开始呢,反而是从“白手起家”的《新青年》开始?这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及文化氛围紧密相关。进入民国之后,尽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庄严宣称“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接下来的北洋政府时期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钳制言论自由最严重的时期之一,仅1913年被封杀的报纸即达四十余家<sup>[9]</sup>。而商务印书馆又有杂志遭到查处的经历<sup>①</sup>,因此,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商务印书馆的政治态度是趋于保守中立的。这种保守中立、失去政治敏感度的态度导致了《小说月报》出现了滑向“鸳鸯蝴蝶派”的倾向,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受新文学指责的旧派文学的堡垒。相反之下,《新青年》当时正处于销量不佳而导致的经费危机中,这种危机加上陈独秀等人的留学背景,让该刊能够“铤而走险”,试图用振聋发聩的观点去赢取读者市场,导致了其后新文化运动成为“燎原之火”。到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时候,新文学已在整个文化格局里面站稳了脚跟,茅盾的革新对《小说月报》的意义犹如《新青年》之于全国的意义,尽管茅盾后来被撤离了主编岗位,但其在《小说月报》里开创的

新文学精神空间及留下的新文学编辑理念却被后来的编辑郑振铎及叶圣陶继承了下去,使《小说月报》再也回不到旧派文学的阵营里面。同时,像《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属于综合类的期刊,更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对旧文化、旧文学的“破”,而对新文学的建设,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成为第一份真正的新文学期刊,其功绩不言而喻。

### 三、结语

《小说月报》前后期存在的“界线”问题,对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桎梏,传统“新与旧”、“现代与非现代”的研究框架所带来的断裂性及含混性缺陷不能在既有的模式下得到有效解决。伴随着“民国文学”倡议而不断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民国文学机制”主张将《小说月报》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考察作家、期刊在当时各种社会机制的制约或促使下是如何形成他们独特的精神的,这是之前研究《小说月报》所未能重视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一步,“民国文学机制”正在此点上能够有效地回应《小说月报》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借助“民国文学机制”,我们得以详细考察作家及期刊与社会发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审视现代作家及文学期刊是如何一步步从近代转型过来的。《小说月报》长期被研究者忽视的问题重新浮现,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支撑起《小说月报》在现代文学期刊中的独特景观。将“民国文学机制”引入到《小说月报》研究,从对当前存在问题的回应,到研究态度、方法、内容的再次定位,都显示出比既有研究框架更为宽广的视野,使得《小说月报》的研究不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概念”、“意识”之争,向着更具有生命力的深处进发。《小说月报》的研究如此,其他文学期刊的研究也是如此。“民国文学机制”在返回自然时序拓展研究视野的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相应的技术路径,从作家的生存空间、传播的基本渠道及文化精神方面让研究者不带着“成见”去“发现”一些曾经被“遮蔽”的文学史实,

重新发现这些基本史实的阐释空间,这对研究者而言,无益更具有操作的实在性。更重要的,“民国文学机制”要求文学研究者发挥其“主体性”,提倡研究者自身的“体验”,而不是盲从于既往的概念或当前西方的潮流,对于扭转当前研究中对西方各种理论的盲从,形成研究者各具特色的研究,寻求切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无疑具有裨益。而这,恐怕也是“民国文学机制”最终的旨归所在。

#### 注释:

- ① 比如1917年1月19日的《张元济日记》记载:“因越南及新加坡两处禁制本馆《东方杂志》,牵及他书,并扣查各货……总以不登战事为是。”

#### 参考文献:

- [1] 茅盾. 现代小说导论(一)——文学研究会诸作家[M]//中国新文学大系. 上海:上海良友公司,1936:3.
- [2] 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46.
-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
- [4] 段从学. 《小说月报》改版旁证考[J]. 新文学史料,2005(3).
- [5] 董丽敏. 《小说月报》革新断裂还是拼合——重识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月报》的关系[J]. 社会科学,2003(10).
- [6] 谢晓霞. 过渡时期的杂志: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J]. 宁夏大学学报,2002(4).
- [7] 李怡. 从历史命名的辨正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J]. 文艺争鸣,2011(7).
- [8] 李怡. “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 [9] 侯宜杰. 袁世凯剥夺国人言论自由[J]. 历史档案,2010(1).

责任编辑:夏莹

(Email: silvermania@qq.com)